

清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

吳仁安

上海師範大學基礎教育學院

清代的上海地區乃全國經濟文化之重心所在，而申江之著姓望族則為當時上海社會的領導力量。何謂望族？北宋詞人秦觀(1049—1100)在其《王儉論》裏說：「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因此，所謂望族，通俗而言就是指社會上頗有聲望的官僚、地主等的家族，亦即著名的縉紳官僚地主階級家族。他們或有財有勢，或深孚衆望，聲名煊赫，雄踞一方，在當地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裏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儉，恆足以樹齊民之望而轉移其風俗」，¹足以影響一方。學者吳大琨曾說：「記得過去有名的優生學專家潘光旦教授就大量徵采過族譜，用來研究優生學。我不想研究優生學，卻很想根據這些族譜來研究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家族一直在社會的發展中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區的文化發展情況，就必須弄清楚這一地區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況，兩者是不開的。」²顯然，這裏所說的「代表性家族」，主要即是指那些「著姓望族」。因此要研究清代上海地區的社會經濟史，必須弄清楚清代上海地區「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況」，亦即研究清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筆者根據家乘、族譜、地方志及清代文人筆記等資料，撰成此文，以饗讀者，求正方家。

* 上海地區：按現今行政區劃，包括松江縣、崇明縣、青浦縣、金山縣、奉賢縣、南匯縣等六個郊縣和嘉定區(即以前的嘉定縣)、寶山區(即以前的寶山縣)、浦東新區(主要是原川沙縣地)、閔行區(由原閔行區和大部分原上海縣地構成)及黃浦區、盧灣區、靜安區、徐匯區、南市區、閘北區、虹口區、楊浦區、普陀區、長寧區等十四個市轄區，全上海地區總面積約6186平方公里。在清代，上海地區諸縣分屬太倉直隸州(崇明、嘉定、寶山三縣)和松江府(華亭、婁縣、上海、青浦、金山、奉賢、南匯等七縣和川沙一廳)，行政上則均受清朝江蘇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即俗稱「上海道」)的節制管轄。

1 張海珊《聚民論》，載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八《禮政》。

2 吳大琨《筆談吳文化》，《文史知識》，1990年11期，頁10。

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

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地區，早在唐宋時期就已經是全國的重要財賦中心。入明以來，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更有了長足的進展。同時，明統治者在政治上也大力扶植江南縉紳官僚地主階級，形成了有明一代「江南縉紳獨盛」的局面。但迨至明清鼎革之際，江南著姓望族則遭到了極大的打擊。當清兵以勝利者姿態進入江南地區後，所到之處，一路上燒殺擄掠，暴行累累，連「縉紳衣冠」之家也不能幸免。如清順治二年乙酉(1645年)六月，清兵至蘇州，「三五為羣，分道掠奪」，豪家巨室亦「搶劫如洗矣」。³清兵攻克松江，則「獨我松〔江〕沈猶龍起義守城，李成棟率師破之，橫屍遍路，婦人金寶網載而去。其破城之初，由郡東察院延燒至秀野橋，大街東西之房，百無一存者。……鄉紳之樓臺亭榭，盡屬荒邱」。⁴而清朝地方官對江南士紳的百般凌辱，則在松江等地又激起了明代縉紳官僚地主的反清活動：「乙酉五月，清師南渡，江南諸郡悉效順，松守遂棄官去，華亭令張大年以城降。時豫王在金陵，遣參軍洪恩炳充安撫使，與大年俱來。恩炳小人為安撫也，驕甚，入郡據公府上坐，令大年匍伏謁見，郡頗嘩，而是時薦紳先生則爭出投謁矣。〔明〕吏部左侍郎董公羽宸、光祿卿許公譽卿，其居鄉素重，亦出謁，而安撫者色甚倨。郡之賢士大夫吏部考功主事夏允彝、兵科給事中陳公子龍，方以國謀奔海外，而郡少之憤於安撫者，曰以民不忍告。……子龍聞之心動，往謀於充彝，充彝曰：是不可為了，而義不可已也。始聽之。孚遠輩聞之大喜，即部署喜事少年，得數百人，起兵有日矣。」⁵

清朝統治者用武力次第鎮壓了鄉紳明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領導的嘉定縣義師抗清活動，由鄉紳明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吏部主事夏允彝、舉人徐孚遠等領導的松江郡城反清活動，由金山衛城指揮使侯承祖等領導的金山衛城抗清活動，以及徹底打敗了明朝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明羊腸湖總兵黃蜚率領的明軍。迨至順治二年乙酉九月，上海川沙、南匯等地孔貞伯領導的抗清活動被清總督李成棟提兵剿滅之後，⁶上海地區諸縣城鎮的反清武裝活動基本上都在清統治者的武力鎮壓下宣佈失敗了，上海地區從此進入清朝統治時期。

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主要由跟隨滿清貴族平定天下的領兵武將勳官「新貴」、家

3 《蘇城記變》，《明季史料叢刊》本。

4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載《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4。

5 宋轅文《東村記事·雲間兵事》，《明季史料叢刊》本。

6 乾隆《上海縣志》卷十一《兵燹》載：「順治二年九月，浦東拜空邪教孔貞伯為首，聚眾不剃髮者數千人，揭竿稱兵，反攻川沙城堡。……總督李成棟提兵剿之，共殺萬餘人。」

世業儒的知識層人士自科舉入仕起家者和明代世家望族的後裔等三大部分所組成。

清初，滿清貴族剛入主上海地區，因立腳尚未穩定，故特別重視那些趨附滿清政權的帶兵武將助官「新貴」，著意將他們培植成爲其統治江南的社會基礎、滿清王朝的柱石。因此，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首先是由那些跟隨滿洲貴族南征北戰、平定天下的帶兵武將助官「新貴」所造成的。華亭縣陳福家族便是其中一例。陳福之父陳德明原爲明朝榆林副將，與農民軍李自成部作戰時陣歿。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定陝西，陳福應募隸寧夏總兵劉芳名標下，爲把總、擢守備，累官陝西提督。陳福一弟陳壽亦爲清廷優擢爲鴻臚寺少卿。康熙「三藩之亂」時，王輔臣、陳彭、朱龍三人受吳三桂總管、巡撫、總兵等僞職。他們糾黨四出，進擊陳福。結果，陳福被害。清廷嘉獎陳福爲國捐軀，超擢其另一位弟涿州參將陳奇爲天津總兵，優贈陳福爲三等公，賜祭葬如典禮，諡「忠愍」，以三等子爵，予襲九次。康熙十九年(1680)，陳壽將陳福長子陳世琳攜至京師襲爵，尋授陳世琳爲直隸三屯營副將，遷古北鎮總兵。世琳卒後，其子陳益(陳福之孫)襲世職，官至雲南楚姚鎮總兵。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廷念陳福致命疆場，克紹義烈，命予子爵，襲次滿時，再予恩騎尉，世襲罔替。陳益卒後，其子陳大用(陳福曾孫)襲爵，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江南提督。陳福家族入籍華亭縣，即在陳大用罷任之後。爾後，陳大用的子孫後裔亦均世襲罔替，簪纓聯翩。如陳大用子陳均(陳福玄孫)以其高祖陳福官職錄蔭，官至安慶協副將；均子陳述祖(陳福來孫)錄蔭襲爵，官至建寧鎮總兵；述祖子陳汝霖(陳福昆孫)錄蔭襲爵，署提標中營參將。⁷可見，華亭縣陳福家族確是個清初領兵武將助官「新貴」起家的名門望族。

再舉崇明縣王鳳家族爲例。崇明土著王鳳，少有膽略，勇毅絕倫，年三十尚爲布衣，誓以身許國。聞耿精忠叛福建，遂從征，授把總。攻取大溪灘，復仙霞關，功皆冠軍，遷福寧千總。破泉漳，復惠安縣，以功加游擊銜。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清軍大進，王鳳先登攻萬人礮、橫塘江，戰功最著，凡破寨一十九，殺敵四千餘，詔加左都督，世襲「拖沙喇哈番」。陞貴州大定總兵，署提督。年七十三歲致仕，卒贈光祿大夫。王鳳之子王光含，以蔭入監，官至刑部雲南司員外郎。王光含兩子，長子王銘(王鳳長孫)，官至狼山左營游擊；次子王鍾(王鳳次孫)，官杭州前衛守備。這樣，崇明縣這個在清初以領兵武將助官起家的王鳳家族亦成了衣冠之家。⁸

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其次是由「家世業儒」的知識層人士以科甲入仕起家者。當順治二年乙酉五月清兵攻滅南京的福王政權以後，除了尚有張煌言等領導的浙東義士的反

7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十五；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六。

8 民國《崇明縣志》卷十一。

清活動和鄭成功等領導的東南沿海軍民的抗清活動之外，當時江南其他各地人民的反清活動也是如火如荼地進行的(諸如閻應元等領導的江陰縣人民的反雜髮活動、毛二和赤腳張三等領導的太湖流域的農民和漁民的抗清活動，以及上述的上海縣以孔貞伯為首、嘉定縣以侯峒曾等為代表、松江郡城以沈猶龍等為代表的上海地區諸縣城鄉人民的反清活動)。因此，在清朝統治之初，東南沿海、江南地區這半壁江山還是很不鞏固的。滿清為了分化抗清力量以穩定統治，就極力拉攏漢族地主，在用武力鎮壓反抗的同時，又開始從文治方面箝制思想，消弭人們的反側之心。清廷籠絡江南漢族地主士大夫的方法，主要是實行了自隋唐以來歷代統治者所慣用的科舉制度，為漢族地主階級參加政權開闢道路。早在入關之初，范文程就向清廷獻策：「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⁹力勸清廷利用科舉制度來收買知識分子，鞏固滿清王朝的統治。順治二年丙辰七月浙江總督張存仁上疏云：「近有借口雜髮，反順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處處勞大兵剿捕，竊思不勞兵法，莫若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¹⁰於是，從順治二年起清朝就正式實行開科取士制度。當時一些觀望形勢的文人，有不少就紛紛屈節報名應考，「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都心甘情願地去充當新朝鷹犬了。清初，上海地區一些「家世業儒」的知識層人士即是以前科甲入仕起家而逐漸發展成為著姓望族的。例如，清初上海地區金山縣張堰鎮王廣心家族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王廣心的曾祖王嗣響，字霆叔，明朝隆慶、萬曆年間諸生，他與同郡的唐文獻、許樂善、章憲文、楊繼禮並少同學，但在唐、許等人顯貴之後，王嗣響對他們卻從不報謁，有所贈饋亦堅辭不受。歿後，學者私諡為「貞簡先生」。王嗣響的曾孫王廣心，字伊人，號農山，金山縣張堰鎮人，「故儒家子也」，少工詩文。明崇禎五年(1632)入幾社，清順治六年(1649)成進士，授行人，遷兵部主事，擢御史，以御史巡視倉場。王廣心有子三人：長子王頊齡(1642—1725)，字顯士，康熙十五年(1676)進士，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卒諡「文恭」。次子王九齡，字子武，康熙二十一年(1682)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季子王鴻緒(1645—1723)，初名度心，字季友，號儼齋，又號橫雲山人，康熙十二年(1673)考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及第，曾充任《明史》總裁官，陞擢為左都御史。王廣心及其三個兒子王頊齡、九齡、鴻緒「一家父子四登科、三入詞林，亦吾郡近來科名最盛者」。¹¹王廣心家族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科第蟬聯，簪纓鼎盛，是清初上海地區一個新興而享有盛譽

9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范文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353。

10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浙江總督張存仁疏言，《清世祖實錄》卷十九，載《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三冊，頁168。

11 葉夢珠《閩世編》卷五《門祚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22—123。

的名門望族。¹²此外，如上海縣曹垂璠家族、¹³南匯縣朱錦家族、華亭縣顧大申家族、婁縣張淇家族、嘉定縣王輯汝(康熙癸巳狀元王敬銘的祖父)家族等等均是清初上海地區由「家世業儒」的知識層家族以科甲入仕起家的著姓望族。

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再次是由明代世家望族的子孫後裔所造成的。這類望族為數最多，情況亦最為複雜。葉夢珠在《閱世編》卷五《門祚》所列的「雲間望族」之中，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破家者約佔三分之一，入清後由衰落而重又家聲復振者約佔三分之一，情況不明者亦約佔三分之一。明清兩代的社會性質是相同的，兩代著姓望族的階級基礎也相同，都是縉紳官僚地主。¹⁴因此，清初對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明代望族士大夫而言，只要他們符合三個條件：一、有子孫後裔繁殖生息連綿不絕者；二、子孫後裔科第綿延不絕者；三、效忠於滿清統治者。如果他們全部符合這些條件，那末他們在入清之後同樣可以維持著姓望族的社會地位。例如，奉賢縣蕭塘鎮的宋氏家族(即葉夢珠《閱世編》卷五《門祚一》中所謂的「虹橋宋氏」)，早在明代中葉，奉賢名士何良傅在其《祭宋欽齋叔丈文》中就指出：「松之望族，首著蕭塘，衣冠閥閱，詩禮文章。」¹⁵宋璫，字克純，明正統乙丑(1445)進士，授御史。其弟宋瑛，字克輝，明天順丁丑(1457)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宋璫裔孫宋堯明，字憲卿，嘉靖甲子(1564)舉人，為德化縣教諭，陞歸化縣令。所著詩文數十萬言，才情橫溢，為藝林所推。堯明之弟宋堯武，字季鷹，隆慶戊辰(1568)進士，授信陽知州，改南雄通判，擢惠州知府。晉參滇南，分守金滄。居滇一年告歸，卒年六十五歲。堯武之子宋存標，崇禎壬午(1642)副榜，授南京翰林院待詔。存標之弟宋徵璧，初名存楠，字尚木，崇禎癸未(1643)進士，授中書，充翰林院經筵展書官。入清，宋徵璧用薦授秘書院撰文中書，從征舟山，轉禮部員外郎，歷知潮州府。存標從弟宋徵輿(懋澄子)。宋懋澄係堯明長兄宋堯愈之子，字幼清，萬曆壬子舉人，著有《九齋集別集》行世，字毓文，號直文，清順治丁亥(1647)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輿次子宋祖年(懋澄之孫，宋堯明從曾孫)，字子壽，清順治甲午(1654)舉人等等。可見，奉賢縣蕭塘鎮宋氏家族在明代科名赫奕，簪纓鼎盛，是上海地區頗有影響的名門望族。這個宋氏望族的

12 參閱清王顯曾(王頊齡曾孫、王廣心玄孫)編撰金山縣張堰鎮《王氏家譜》和清王圖煒《王鴻緒行述》。

13 《上海曹氏族譜》舊序，曹浩修，民國十五年上海曹氏崇丞堂排印本。

14 關於明清時期的縉紳地主，近年來史學界頗有爭議。筆者認為明清時凡享有各種政治特權的地主(除皇族、功臣助貴等外)，可統稱為縉紳地主。參閱濱島敦俊《明末江南鄉紳的家庭經濟——關於南潯鎮莊氏的家規》一文的《序言》及其註解，《明史研究》，第二輯，頁83—84；張仲禮《中國紳士》第二節「紳士階層內兩個集團的適當劃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導言》頁1—10，書本頁4—6。

15 何良傅《祭宋欽齋叔丈文》，載《雲間兩何君集·禮部三》之《何禮部集》卷之十。

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士大夫後裔，入清後，願意做大清順民，表示擁護滿清皇室的統治，並用實際行動盡心為滿清王朝服務，因此宋氏家族在清初又繼續保持住了著姓望族的社會地位。¹⁶又如，清初金山縣曹爾堪家族亦是由明代曹豹家族延續下來的名門望族。¹⁷

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明末清初的上海文士葉夢珠在其所著《閱世編》所列的六十七家「雲間望族」之中，情況不明者（即這些望族究竟是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動亂中破家衰落的，還是在入清後「家聲復振」的？）竟約佔三分之一。但我們今天根據有關譜牒、文人筆記文集及地方志等史料細加考證，卻發現這所謂「情況不明」的三分之一明代望族中有很多家族在入清後還是繼續保持了望族地位的。例如，《閱世編》載：「雲間望族，首推陸氏；昭侯以降，盛衰遞有，不必言矣。明嘉靖中，文定公〔陸〕樹聲及樹德相繼登進士。文定以辛丑會元入詞林，官至大宗伯。樹德以會魁官至開府，其後軒冕蟬聯，不一而足。以予所見，崇禎壬午一科，應天中式兄弟四人，慶臻、慶衍、慶紹、亮輔。亮輔字左臣，慶衍字椒頌，俱癸未〔崇禎十六年〕聯捷。其他明經、茂才異等不下數十餘人，可謂一時極盛。自鼎革後，日漸中落。順治己丑，族子蘭陔振芳復成進士，官至少參。丁酉，裔孫慶曾順天中式，未幾譴謫，以後未有達者。」¹⁸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葉夢珠當然不可能預料自己身後這「雲間望族」陸樹聲家族在清代的聞達與否。作者看到陸氏家族「自鼎革後，日漸中落」，這確是事實；但若以此事實來推論該家族「以後未有達者」或者將其列入「情況不明」者之中，則未免武斷了。其實，陸樹聲家族入清之後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自清初迨至清代中葉，一直是維持了望族的社會地位的。明代青浦縣陸氏家族代表人物陸樹聲（字與吉，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的曾孫陸慶曾，字子元，清順治丁酉（1657年）舉人，以科場案徙東北瀋陽，卒於戍所。其弟陸慶臻，字集生，明季舉人，清順治八年（1651）揀選為推官。慶臻第五子陸箕永（陸樹聲玄孫），字二水，庠生，康熙皇帝南巡時獻呈廬山賦，奉旨賜監生入直武英殿修書，選為四川綿竹知縣，以明惠稱。雍正二年（1724）擢陞古北口同知，四年（1726）調任廈門同知攝興泉道事，卒年六十四歲，著有《賜書堂稿》。慶臻孫陸瑜（陸樹聲來孫），字冠吳，康熙時舉人，官泰興縣教諭。慶臻玄孫陸伯焜（陸瑜孫，陸樹聲仍孫），字重暉，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高宗弘曆東巡召試，欽賜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陸伯焜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1785）大考第一，晉陞侍讀學士，累遷鴻臚寺少卿，擢陞江西按察使，調任浙江按察使，

16 光緒《重修奉賢縣志》卷十、十一、十二；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一、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及五十六；另參閱清闕名者輯《雲間世家考》及董含《益管感逝錄》等。

17 光緒《金山縣志》卷十八、十九、二十；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另參閱明曹津（曹豹族孫）編輯《干溪曹氏族譜》。

18 《閱世編》卷五《門祚一》，頁114—115。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旋引疾歸里。¹⁹因此，這個青浦縣明代官宦世家的「雲間望族」陸樹聲家族，入清後依然維持了望族的社會地位。類似青浦縣陸樹聲家族那樣在《閱世編》中列入「情況不明」，但在實際上入清後卻仍然維持了著姓望族地位的家族，在清代前期的松江府境內亦頗多。另外，在當時「雲間」松江府所屬七縣一廳之外的嘉定、寶山和崇明三縣（這三縣在清代均屬太倉直隸州管轄），清代前期繼續保持住著姓望族地位的明代舊有望族也甚多。例如，嘉定縣的孫致彌家族、²⁰崇明縣的宋德宜家族，²¹均是從原來的明代著姓望族入清後繼續維持和發展了的望族。

另有一些明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他們在明末清初鼎革中衰敗之餘，由於子孫後代入清後又在新朝中舉或成進士，從而在清代「家聲復振」的，例如奉賢縣橫港的彭應麟家族。彭應麟字泰符，明嘉靖甲辰（1544）進士，授浙江樂清知縣，擢陞南京刑部郎中，旋出為邵武太守。應麟長子彭汝達，嘉靖辛酉（1561）副貢；應麟次子彭汝讓，萬曆癸酉（1573）副榜。應麟曾孫彭彥昭，字韋齋，萬曆戊午（1618）南榜，崇禎末年任常山縣令，晉陞浙江道御史。橫港彭氏自應麟後「六世相承，代有聞人。……鼎革後，韋齋即世，家漸中落。至康熙丙辰，仲子念韋開祐成進士〔彥昭仲子彭開佑，字孝緒，康熙十五年丙辰進士，歷任河間知縣、武岡州知州，並有政聲〕，家聲復振。」²²其他，諸如松江唐文獻家族、金山縣楊枝起家族、上海縣董其昌家族、華亭縣李沾家族、上海縣潘恩家族及上海縣東門外高慤家族等等望族，也都是因為入清後有子孫後裔考中進士入仕而「家聲復振」後又恢復望族地位的。總而言之，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數量最多的還是那些由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明代望族入清後以科甲蟬聯、簪纓不絕而繼續保持著姓望族地位者。

清代中葉上海地區的新興望族

清代中葉上海地區的新興望族，也可說是康乾盛世上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時期的產物。宋元以後上海地區經濟的兩大主要支柱是棉紡織業和航運業。宋末，棉種和植棉技術輸入上海地區。明代中葉後，松江「沿海之鄉多種」木棉。²³至萬曆年間，棉花已成為上海地區最主要的農作物。隨著棉花生產的發展，上海地區的棉紡織業也日益興盛起來。明中葉後，在南京、蘇州成為全國最大的絲織業中心的同時，上海地區也發展成為全國最大

19 光緒《青浦縣志》卷十七、十八、十九；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三、五十六；另參閱陸樹聲之子滙刻《陸文定公全集》及金章《雲間氏族考》等。

20 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

21 乾隆《崇明縣志》卷十六。

22 《閱世編》卷五《門祚一》，頁124—125。

23 正德《松江府志》卷五。

的棉紡織業中心，「衣被天下」。迨至清代前期，棉紡織業已經成為上海地區城鎮經濟中最重要之支柱，並對上海地區的其他城鎮經濟施以既深且大的影響，諸如促進社會分工的擴大，使軋花業、紡織品加工業及紡織工具製造業先後形成為各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促進了蘭靛業和以沙船業為主的航運業的發展；以及引起各種商業性農產品之間的交換，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等等。特別是刺激了上海航運業的發展。²⁴上海原是由海上貿易和航運業的發展而形成的一個市鎮，初設縣時「地方人士大半是海洋貿易之輩」。²⁵胡祥翰《上海小志》云：「沙船之制，始於元，而直創於上海。」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前期，上海地區紡織業的興旺也刺激了沙船業的發展，「沙船雲集上海，實緣布市」。²⁶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開放海禁，上海以棉、布貿易為基礎的航運業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據史載，清代前期上海沙船業擁有沙船三千五、六百艘，僱傭「在船水手十餘萬人」，總資本達二千四、五百萬兩，是鴉片戰爭前上海資本主義萌芽中實力雄厚的一個行業。²⁷總之，上海地區城鎮經濟的迅速發展，迨至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在棉紡織業和航運業等重要行業中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並有了程度不同的發展。²⁸

清代中葉，正是清代上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海地區新城鎮不斷湧現，²⁹同時也產生了不少新興望族，諸如婁縣張照家族、嘉定縣錢大昕家族、青浦縣王昶家族、嘉定縣王鳴盛家族、南匯縣吳世賢家族、崇明縣徐大始家族、青浦縣徐恕家族、「南匯新場葉氏」及寶山縣胡巷橋印光任家族等等。在這些清代中葉上海地區新興的望族之中，有些是出身貧寒，在一次科舉中式的機會中，逐步走入士大夫行列，子弟又以科第綿延保持住這種社會地位，而終於發展成為著姓望族的。例如，青浦縣朱家角鎮的王昶家族。王昶先世祖籍浙江省蘭谿縣，其高祖王懋忠始遷居並定籍松郡青浦縣西珠街閣（今上海市青浦縣朱家角鎮）。王懋忠列名幾社，以詩名，崇尚氣節。王昶的曾祖王之輔、祖父王璵、父親王士毅，均為布衣。王昶字德甫，號述庵，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歿於嘉慶十一年（1806）。王昶青少年時代家境清寒，但他貧窮志不移，曾寫有《固窮賦》以自勵。王昶在乾隆甲戌（1754）成進士，清高宗弘曆南巡，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致仕。王昶七十歲時獲準辭職回鄉養老，清高宗曾諭示：「歲暮寒，可俟春融歸。」王昶歸里之後因築春融堂於朱家角鎮蘇葭浜，以頤養天年。他的摯友

24 參閱拙作《明清時期上海邑城的社會經濟結構探索》，載《上海研究論叢》，第五輯；《論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徽州商人》，載《上海研究論叢》，第六輯。

25 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紀風俗》。

26 《安吳四種》卷二十九。

27 《中國資本主義問題討論集》，頁427。

28 參閱拙作《從方志看清代上海地區城鎮經濟的變遷》，《華東師大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二期。

29 參閱拙作《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的勃興及其盛衰存廢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錢大昕常坐著一葉扁舟，從嘉定到朱家角鎮春融堂來同他論學談藝。王昶嗣子王驥和，字潔芳，監生。驥和之子王紹基(王昶孫)，字純夫，諸生，咸豐元年(1851)詔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可見，青浦縣王昶家族乃是清代中葉上海地區一個新興的著名家族。³⁰清代中葉上海地區新興望族中，也有由小知識分子或小官吏家庭出身的士大夫逐漸積累形成的望族，如寶山縣印光任家族、青浦縣徐恕家族等等。先介紹寶山縣胡巷橋印光任家族：印光任祖父印世臣，諸生；光任之父印輯瑞，候選州同。印光任字黼昌，廩膳生，雍正五年(1727)詔舉孝友端方，由總督伊繼善薦之，發廣東以知縣用，補知廣寧縣，調任高要令，再調東莞知縣。印光任所到之處，為民除害，修建學校，設立書院。在新興縣任職時，有人誣告仇人謀反，印光任審訊後釋放了無辜被拘的四百多人，有政聲。調任為海門同知。後被彈劾，引見後仍被派往廣東。其時澳門添設同知，印光任被委任南澳同知。後陞任為廣西慶遠知府，調知太平府，皆有善政。後因牽涉到鹽引滯銷一案，免職歸鄉，卒年六十八歲。印光任編有《澳門紀略》一書。光任之子印憲曾(印輯瑞孫，印世臣曾孫)，字昭服，乾隆十五年庚未(1750)舉人，辛未進士。分發廣東以知縣用，補翁源以能吏稱，內擢吏部主事，三遷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授浙江寧紹臺兵備道。憲曾之子印鴻經(光任孫，輯瑞曾孫，印世臣玄孫)，字章天，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舉人，辛丑進士，改庶吉士。鴻經之弟印鴻緯，字庚賁，以監生考充三通館膳錄。乾隆南巡，鴻緯獻賦取置一等。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寶山縣印氏家族三世顯宦，門第之盛甲於淞陽，是清代中葉上海地區一個由小官吏家庭出身的士大夫積累而成的新興望族。³¹

再介紹青浦縣徐恕家族：徐恕的父親徐葵，縣學生員，居青浦縣蔣浦。徐恕，字心如，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進士，授寧海知縣，調任平陽令。晉陞湖州知州，調任杭州知府，遷浙江糧道。歷署浙江布政使、山東布政使。乾隆己亥(1779)冬十二月，署中火，徐恕入內取印，被焦灼卒，贈副都御史。徐恕之弟徐憲，優貢生，考補正黃旗教習，以知縣捐陞主事，後加員外郎。徐恕之子徐逢豫(徐葵孫)，字簪齋，以蔭入仕為主事，由兵部武選司郎中授大順廣兵備道，以清謹著稱。秩滿入京引見，嘉慶皇帝詢及家世，逢豫以父徐恕歷官奏對。帝齋顏溫諭曰：「汝當學汝父為官。」旋陞徐逢豫任長蘆鹽運使。逢豫之孫徐崧(徐恕曾孫，徐葵玄孫)，歷任鎮海、富陽、太平縣丞，署浙江秀水知縣，並有循聲。可

30 參閱清嚴榮編《述庵先生年譜》；清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載《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册，頁204—205；馮學文主編《青浦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780。

31 光緒《寶山縣志》卷九；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朱保和主編《寶山縣志》卷三十一《人物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069。

見，青浦縣徐恕家族亦是清代中葉上海地區一個由小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士大夫積累而成的新興的著姓望族。³²

清代中葉上海地區新興望族之中，以「素封起家」或者「以資起家」的亦甚多。例如，崇明縣徐大始家族就是「以資起家」模式的典型。徐大始的祖父徐朝玉，據縣志記載：「朝玉讓產於兄朝璽，而挈妻渡海，見通州與崇明縣境間漲沙壘接，乃召侶墾刈成田十五萬畝，沙後撥海門建廳，遂家焉。子三：淮、岳、浩。」陳朝玉屯田十五萬畝，經營農業致富成了土財主後就「以資起家」。朝玉長子陳准考中秀才，次子陳岳「例選安徽池州府經歷」；季子陳浩，官中城兵馬司指揮，左遷光祿寺署正，改知州。陳准之子陳世傑（朝玉孫），字偉齋，「例選浙江杭州府經歷」，歷署平陽、會稽、平湖縣事。陳岳長子陳大始（朝玉孫），字寶禾，「援例」選廣西新寧知州，政績卓異，大吏器重之，歷署桂平、容縣知縣，平江府同知，陞西隆州知州。陳大始會攝南寧府事，以母艱歸，卒於家。大始之弟陳大經，官湖南布政司理問。陳朝玉曾孫輩的陳璠，以太學生「例選」陝西甘泉縣丞，後攝縣事；陳三合（大始長子），以庠生例貢太學，嘗侍父陳大始西隆州戎幕，以軍功議敘訓導，改縣丞；陳三珠（大始次子），「例選」典史。經過三世的積累，至陳朝玉的玄孫陳兆熊（三合子，大始孫，陳岳曾孫）時終於獲得科舉高第。陳兆熊字伯元，幼從蘇州名儒江沅游學，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功臣館纂修。道光乙酉（1825），陳兆熊充任福建鄉試副考官，適正考官翁心存病，兆熊獨任校閱。踰年，以勞累卒於京邸。崇明縣陳大始的家族簡史表明，它是清代中葉上海地區「以資起家」的新興望族的典型。³³

正如前所述，由於明清時期的社會性質相同，清代初期和中期的著姓望族的階級基礎亦相同，因此，清代中葉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數量最多的還是來源於明代及清初上海地區世家望族的後裔所繼承並光大的望族，諸如婁縣張照家族、南匯縣新場鎮葉映榴家族、嘉定縣王鳴盛家族等等均屬此類望族。先介紹南匯縣葉映榴家族。南匯新場鎮葉氏，創始人葉有聲乃明朝萬曆年間進士，由知縣擢陞禮科給事中，終左副都御史。葉有聲生子三人：長子葉翊龍、次子葉景龍俱以明經薦；季子即大名鼎鼎的葉映榴。葉映榴（1642—1688），字炳霞，號蒼岩，順治辛丑（1661）進士，由庶吉士歷任禮部郎中，陝西學政、湖北督糧道，署布政使。在康熙二十八年戊辰（1688）湖北兵變事件中，湖北督糧道葉映榴自刎殉國。清廷下旨褒嘉，特贈映榴工部侍郎，立祠武昌，欽書「丹心炳冊」扁額以賜。葉映榴長子葉敷，字來青，初以諸生廕補荊門知州，有惠政，官至沂州知府。雍正八年（1730）錄忠臣後，特授葉映榴次子葉芳為蔚州知州，尋改員外郎；又授葉映榴之孫葉鳳毛（葉敷

32 光緒《青浦縣志》卷十八；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九；並參閱青浦縣《徐氏家譜》等。

33 光緒《崇明縣志》卷十一；周之珂主編《崇明縣志》卷三十五《人物》，頁891；並參考黃清憲《半弓居文集》和《潁川支譜》。

之子)爲內閣中書。可見，南匯新場葉映榴家族，乃是繼承了明末南匯縣聲望甚隆的葉氏盛族發展而來的清代中葉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³⁴

次介紹嘉定縣王鳴盛家族。鳴盛的祖父王焜，字大生，康熙丙子(1696)中舉後又考取內閣中書，改任丹徒教諭。鳴盛之父王爾達，字通侯，乾隆三十一年(1766)錄取爲貢生。王鳴盛(1722—1797)，字鳳喈，是錢大昕的妻兄。王氏世居江蘇崑山爲望族，後徙移並定籍嘉定縣。王鳴盛少時師事沈德潛及惠棟，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殿試考中爲進士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編修，歷任侍讀學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福建鄉試主考官等職。清初康熙癸巳(1713)狀元嘉定人王敬銘乃王鳴盛的同族前輩。今上海市嘉定縣博物館珍藏的王敬銘《殿撰山水畫軸》，乾隆年間王鳴盛在此畫軸上題曰：「此幅乃吾家未岩〔王敬銘〕殿撰所作。未成本也。筆意規仿黃一峯老人，蒼秀生動，所云具體。未岩歸道山後，筆墨流傳者都已零落，大幅尤爲難得。此雖未成，丘壑已病，吾弟宜珍藏之。」可見，嘉定縣王鳴盛家族實乃由江蘇崑山縣王氏望族在明末清初徙居並定籍嘉定後延續和光大的清代中葉上海地區著姓望族。³⁵其他如婁縣張祥河家族、南匯縣吳省欽家族等等，也都是來源於明代及清初上海地區世家望族的後裔所延續的著姓望族。

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的世家望族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六月，外國炮火轟開了上海的大門。從此，上海開埠，中外互市，外國勢力日益深入上海地區諸縣城鎮，它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作用：一方面是由於外國機製棉紡織品等洋貨的進口，侵奪了中國手紡紗和手織棉布等土貨的銷售市場，從而造成了以耕織結合和自給自足爲內容的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另一方面，正由於上述原因使上海地區自然經濟逐步瓦解，促使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的產品因而日益增多地捲入了商品流通之中，促進了上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上述社會經濟領域內的巨變，也引起了當時上海地區階級關係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變化。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縮影，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

基於上述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社會經濟變化的歷史背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的世家望族亦有其時代特點。最明顯的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形成了一大批由經營沙船、航運業和「辦

34 薛振東主編《南匯縣志》第三十二編《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680；並參閱同治《上海縣志》卷十九至二十一、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五至五十九，以及《忠節遺稿》等。

35 楊千白主編《嘉定縣志》卷三十五《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105—1107；余永林等主編《嘉定掌故》，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另參閱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及《耕養齋詩文集》等。

海運出力」起家的著姓望族。早在清代乾隆年間，上海港即「凡遠近貿遷皆由吳淞口進泊黃浦，城東門外舳艫相接，帆檣比櫛」，³⁶其中以江南的沙船居多。各種航船的所有者，統稱船商。沙船的「船商」都是崇明、上海、通州、海門、南匯、寶山、川沙等地的土著富民，實際上就是早期的商業資本家。當時崇明縣的殷氏，僑居上海，有沙船十數艘，³⁷資本至少也有一、二十萬兩，但還算不上巨富。崇明縣東鄉的富戶「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時多至百餘艘」，³⁸如湯源興、沙益、張元利等。其時上海巨商張元隆「多聚匪類，廣置洋船，立意要造船百隻，以百家姓為號」。³⁹當時「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一主有船四、五十號」，⁴⁰故造船百艘，資本當在數十萬兩至百萬兩白銀左右。船商通過稅牙向客商攬載貨物，取得運費，一艘船每一年往返的運費收入可得數千，甚至上萬，其贏利極高。故當時上海的豪富，以沙船商為首。這樣，迨至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就湧現出一些經營沙船航運業的新興望族。例如，清代上海縣的王氏家族，即先是業索綯、爾後又以經營沙船業起家的新興望族：「我家自嘉、道來以商舶業稱於時，凡地方要工當路必首請集議。……咸豐癸丑〔1853〕之變，各商船移泊高橋鎮，布貨既擁滯，而北來之貨日翔貴。公〔王慶榮〕遂措本販運，不數年獲利倍。事平，修葺舊宅，復設市肆〔索綯〕。」⁴¹上海縣王氏家族，望出山西太原。⁴²其始遷祖王秀甫，又字繡黼，居上海縣東南周家渡務農，「世守清貧，隱德不曜」，是個尋常布衣百姓。康熙三年甲辰（1664），秀甫之子王君順（字與可）由周家渡遷居上海邑城大東門外太平巷。君順生子三人：聖臣、右臣、良臣。右臣生子二人：世祿、世宗。世祿生子二人：文源、文瑞。上海王氏四世祖王世祿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貧病且歿，兩個兒子王文源、王文瑞由於家庭貧困而兄弟倆自幼一同學習索綯手藝，「比長，聚所絞索為肆。或告以朽索雜新麻，利可倍。堅不肯。曰海舶御風全賴此，輕人命以獲利不為也」。⁴³兄弟倆長大後在同行業中信譽卓著，「貨者踵至，業稍裕」；⁴⁴後來又齊心協力共同經營沙船航運業「販渤海遼瀋間，多億中」，結果「家累鉅萬」。⁴⁵這個上海王氏望族的創始人王文瑞與其兄王文源在清代乾嘉年間以經營沙船航運

36 乾隆《上海縣志·序文》。

37 清姚廷遴《歷年記》（舊鈔本）。

38 齊學棻《見聞續筆·海運海漕議》。

39 張伯行《正誼堂集》卷一。

40 齊學棻《見聞續筆·海運海漕議》。

41 《續修〔上海〕王氏家譜》「王慶昌志」，王師曾編，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42 王壽康編《上海王氏家譜》陸蔭奎《序》：「上海王氏，望出太原。」

43 《上海王氏家譜·錄縣志輯庭公傳》，清王壽康編，鈔本。

44 同上注。

45 同上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業起家，「中歲遂成素封之家」後，著意培養子弟應科舉入仕，「自我高祖輯庭公〔王文瑞〕以商起家，迨曾祖考二如公〔文瑞之子王壽康〕、祖考紫卿公〔壽康第五子王慶棻〕相繼業儒，均有聲庠序」。⁴⁶這樣，「吾家承高高祖張太夫人〔王世祿之妻張氏〕節孝之蔭、高祖輯庭公與高伯祖春泉公〔王文源〕以孝弟起家」⁴⁷的上海王氏，在張太夫人之孫王壽康時已得「秀才」功名，迨至張氏的曾孫、玄孫輩則「多讀書仕宦者」。⁴⁸清代後期，這個上海王氏家族通過捐納和科舉入仕，湧現出了一大批候補知縣、太倉州學正、崇明縣教諭、浙江嵊縣知縣、候補同知、候選郎中、候選知府、浙江候補道、兩署浙江嚴州府知府、兩浙鹽運副使、安徽特用知府等等官吏，成為滬上著名的華腴望族。⁴⁹

又如祖籍浙江寧波小港的李也亭家族，亦是一個在滬上以經營沙船等工商業起家的清季上海新興望族。清朝道光年間，李氏在上海發跡的第一人李也亭從寧波小港家鄉風塵僕僕來到申城，初在上海南市南碼頭「曹德大」槽坊當學徒，十九歲時改行從事沙船運輸業。數年之後，李也亭便由一般水手而「老大」而最後當上了沙船老板，獨資開設「久大」沙船號。因為經營有方，發展到擁有沙船十多艘，成為滬上殷實富戶。經營沙船致富後，李也亭又轉向金融、地產，開設「餘」字號錢莊近十家，組成「天豐」、「地豐」、「玄豐」及「黃豐」四家地產公司，儼然成為申江巨富。李也亭乃兄李弼安有三子：名聽濤、濂水、雨田，房號稱乾房。李也亭本人僅一子名梅塘，房號稱坤房。李氏乾、坤各房子孫人數眾多，金玉滿堂，在清季民初的上海商界、官場、幫會、文化界均聲名煊赫，祖籍寧波小港的李氏家族實乃一個在滬上以經營沙船等工商業起家的清季上海新興望族。

清代道光年間，上海又重開前代沙船海運漕糧之路。因此，在清代後期，上海地區也有一些以「辦海運出力」著稱的新興望族。例如，寶山縣江東（高橋鎮）沈光燄家族，數世襄辦海運，即是一個以辦海運著稱的新興望族。⁵⁰

清代後期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的第二個特點，是當時在滬上湧現出一批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以辦洋務、辦外交、辦實業、做買辦及倡導上海地方自治著稱的社會名流和新興望族。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太平軍曾先後三次進軍上海，當地商人「偶聞虛，便即歇業，因而居民相率效尤，無不驚避，舉市若狂」。⁵¹上海的官僚縉紳地主大為震動，他們

46 《續修〔上海〕王氏家譜》，王師曾編，民國十三年（1924）排印本。

47 同上注。

48 同上注。

49 同上注。

50 光緒《寶山縣志》卷九、十。

51 《袁祖德告示》，見金敏獻等編《太平天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95—296。

積極策劃「借師助剿」，由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琦、候補知府吳雲、候補直隸州知州應寶時和丁憂在家的湖北鹽道顧文彬等在租界成立「上海會防公所」，協調「會防」和進攻太平軍的步驟，勾結洋槍隊等外國勢力共同鎮壓了進軍上海的太平軍。因此，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由鎮壓太平軍起家的著姓望族亦甚多，這裏可以寶山邑城袁氏為例說明。該家族始祖袁佳士，精醫術，年四十八歲始生一子，即文昭。袁文昭字鏡若，世居寶山縣邑城，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中副貢。文昭長子袁翼(袁佳士長孫)，字仲甫，道光二年壬午(1822)以第二人領鄉薦(中學)，歷宰安福、浮梁、廣豐、玉山等縣，政聲卓著；庚子(1840)袁翼為鄉試同考官。文昭第三子袁增，字野漁，官吳淞營外委。咸豐三年(1855)，太平軍東進，大府檄袁增率領本營兵赴鎮江抵抗，袁增作戰時陣亡，清廷卹贈袁增之後雲騎尉世職。袁增從子袁鎮嵩(文昭第四子袁翟之子，文昭孫，袁佳士曾孫)，弱冠隨大伯父袁翼在江西玉山所任上，值太平軍逼境，防營入署索供，幕僕駭走，鎮嵩獨自從容撫止之。袁翼深奇其才，謂軍興之際，苟得寸柄即末僚，亦可自效，因援例指分浙江。同治初元，袁鎮嵩由草坪司巡檢改署淳安縣典史，兼辦威坪釐捐，歷署臨安、嘉興、東陽典史，長浦司巡檢，均有政聲。袁鎮嵩長子袁希濤(文昭曾孫，袁佳士玄孫)，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舉人。袁增的曾孫袁蔭祖(文昭玄孫，袁佳士來孫)，以其曾祖父、吳淞營外委把總袁增與太平軍作戰時陣亡，襲雲騎尉世職。可見，寶山縣邑城袁氏家族是個以鎮壓太平軍起家的官宦之家。⁵²另外，川沙縣邑城徐蘭石家族⁵³和寶山縣邑城徐元吉家族⁵⁴等等，全都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由鎮壓太平軍起家的著姓望族。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上海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的創辦，標誌著上海以至全國洋務運動的實際開始。於是，在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產生了一批以辦洋務、辦外交、辦實業、做買辦和倡導上海地方自治著稱的社會名流和新興望族。在辦洋務方面，川沙縣高橋鎮(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朱其昂家族即是其典型。朱其昂(?—1878)，字雲甫，居高橋，「世業沙船，為淞滬巨商，捐資為通判，累至道員。清咸豐十年(1860)起同美國商人在山東煙臺合夥開設清美洋行，往來上海、煙臺、天津各口岸經營貿易，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各地設有華裕、豐匯銀號，承辦海運多年，任浙江港運局總辦、海運委員。同治十一年(1872)，由李鴻章授意，與朱其韶共同擬定輪船招商局章程。從天津回上海，會集李振玉、胡光墉等人，以身家作抵，任招商局總辦。次年招商局改組，任會辦，負責漕運和官務。上海輪船招商局經朱其昂等力任艱巨，苦心經營，頻年開拓，漸從洋商手中挽回

52 光緒《寶山縣志》卷九、十。

53 黃炎培主纂民國《川沙縣志》卷三《戶口志》之《陸炳麟川沙族譜一斑·徐氏譜略》。

54 光緒《寶山縣志》卷九、十。

利權。至光緒元年(1875)，已有自製輪船，加上承領閩廣輪船八艘，又添加股份，向英國購進二艘，分往南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等處貿易，又承運江浙漕糧。從此中國輪船開始暢行中國海域，成為海防洋務的一大業績。光緒三年(1877)，為招商局購買旗昌輪船公司財產，曾赴江、粵、浙等地籌款。次年由李鴻章委為津海關道。任命三日後去世。⁵⁵朱其昂的胞弟其詔、從弟其懿，均以辦洋務著稱：「弟其詔，字翼甫，繼辦招商局。光緒初，權永定河道，有政聲，旋調清河道。時正辦修築朝鮮電報及直隸、開平礦務暨淞滬鐵路事，未之任。十八年，署津海關道，未接篆，卒。從弟其懿，字叔彝，又字彝甫，幫辦招商局、江蘇海運事宜，任湖南永州、衡州府知府，署沅州、常德府知府，歷辦淞滬鐵路事宜，並任兩江視學官。」⁵⁶由此可見，川沙縣高橋鎮朱其昂家族，確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一個以辦洋務著稱的新興望族。

此外也可舉上海客籍人盛宣懷家族為例。盛宣懷(1814—1916)，字杏蓀，又字幼勛，號愚齋、止叟，原籍江蘇武進縣人。同治九年(1870)經楊宗濂推薦入李鴻章幕，以行營內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甚得信任。同治十二年(1873)任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後陞為督辦。1879—1896年間，盛宣懷還署天津河間兵備道、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後來，盛宣懷以上海為活動中心，遙控漢冶萍鐵煤廠礦，並把持輪電、紡織及銀行業務。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盛宣懷捐資籌建南洋公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因此，盛宣懷實際上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創始人。1907年奉召進京，次年即被任為郵傳部右侍郎。宣統二年年底(1911年初)授予郵傳部尚書。皇族內閣成立後，任郵傳部大臣。可見，上海客籍盛宣懷家族亦是清季一個以辦洋務起家的著姓望族。

清代後期，上海地區也有一些是以辦外交著稱的新興望族，諸如崇明李鳳苞家族、松江雷補同家族等等均是。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擴大和深入，為外國資本家餵養和服務的買辦也日益增多，並逐漸形成了買辦制度。有些大買辦不僅充當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掮客，也成為列強勾結清政府、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的牽綫人，吳健彰和楊坊正是早期上海買辦在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上海買辦勢力進一步發展，活動領域更為擴大，諸如絲、茶、煙葉、棉花、棉紗、染料、煤油、五金等貨無不染指，但其中以外國銀行買辦的地位日益顯要。上海買辦的籍貫隨著買辦人數的擴大也有了較大的變動，即從原來的「半皆粵人」變

55 朱鴻伯主編《川沙縣志》卷三十三《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945—946。

56 民國《上海縣志》卷十七，游寓。

為以江浙人為主，如祝大椿、嚴信厚、王槐山、席正甫、吳少卿、朱葆三等都是江、浙兩省人。隨著上海買辦勢力的發展，從中也產生了一批擁資百萬的大買辦、買辦家族和買辦世家望族。例如，上海滙豐銀行買辦席氏家族、魯麟洋行買辦虞洽卿父子、顏料買辦周宗良及英美煙草公司買辦鄭伯昭等，財富均在五百萬至一千萬銀元之間。⁵⁷尤其是席氏家族，充任買辦者人眾勢盛，財大氣粗，是清代後期上海著名的買辦世家望族。席氏家族任外商銀行買辦，是由席元樂的兒子開始的。席元樂，號品方，又號蘭坡，祖籍蘇州洞庭東山。太平天國時期，「吳中士民流離遷徙，以上海一隅為避秦之桃源」，席元樂即於咸豐年間舉家遷居上海。席元樂的前妻生有二子（長子席素煊，號緞卿，又號縉雲；次子席素貴，號正甫）；續娶沈二園（沈氏亦係洞庭東山人，富有資財，其到滬經商比席元樂還早）之妹沈氏，也生有二子（席元樂第三子席素榮，號縉華；第四子席素恆，號吉成，自小過繼給母舅沈二園為子，後任新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阿四）。席元樂四房子孫，在上海擔任外商銀行買辦的，祖孫三代共有十一人，如果加上幾個席家女婿在內（他們大多是因席家的關係而擔任外商銀行買辦的）則就有十四位買辦。這十四人先後擔任了六家英商銀行、兩家美商銀行、兩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的買辦。其中有些還是最有勢力的外商銀行，如滙豐銀行，從席正甫任買辦起祖孫三代相傳；華俄道勝銀行買辦席縉華和席錫蕃是叔侄相傳。席家不僅是買辦世家，富有資財，且同清朝官府關係密切，如席正甫就曾與當時的清上海道袁樹勛（海觀）結成換帖兄弟。總之，祖籍蘇州洞庭東山的席氏家族，不僅充任買辦者人眾勢盛，而且與上海地方官府關係非同一般，門庭富貴，聲勢煊赫，是清季上海灘上首屈一指的買辦世家望族。⁵⁸此外，當時與席氏有關的王、胡、許等三個買辦家族亦頗具經濟實力。

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上海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有關研究資料表明，上海最早創辦的是外資企業，如銀行、書館、自來水公司、電燈廠和電車公司。接著設立的是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等清政府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再後纔有民族資本企業如商務印書館、求新機器廠等的開創。從鴉片戰爭到清朝覆滅的七十餘年時間裏，上海不僅是全國進出口貿易的中心，也是中國近代企業最為集中的城市。因此，清代後期的上海地區也產生了不少經營近代工商實業的著姓望族，例如金山縣楓涇鎮沈鐸家族。楓涇沈氏系出姬周，武王受命同母弟聘季（周文王第十子）食采於沈，以國為氏。自清朝康熙初年由聘季後裔沈鐸遷居松江府金山縣楓涇鎮以來，楓涇沈氏在該鎮聚族而居，瓜

57 劉惠吾《上海近代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上册，頁235。

58 吳培初《舊上海外商銀行買辦》，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6輯《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96—10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跌綿綿，遂為著姓。從康熙初年至清末民初，沈鐸一脈傳下十二世，歷時二百餘年。沈氏子孫或為孝悌力田，或為闢闢顯著，或以奇才異能見，或以篤行高節稱。迨至清代後期，楓涇鎮沈鐸家族在工商實業界的著名人物有：沈氏遷楓涇四世祖沈起昌（沈格嗣子，字學周，國學生）業賈設肆於楓涇北鎮永昌坊，店號稱「裕昌」，以經營桐油、麻皮著名，有「沈麻皮」之稱。兼善堂（沈起昌第二子沈燕創設）支沈坤（字凝齋，號甸安，沈燕之子，諸生），經營商業輒能出奇制勝，積資增置田畝，並建太平坊住宅。沈坤曾孫沈樂康（字峻範，沈燕玄孫，沈起昌來孫），由附貢生報捐縣丞，指分江蘇試用；脫離政界後居住滬上經營實業，獨資萬金在金山縣的橫柳要隘建立繭廠一所，名稱為「沈有利繭廠」，事業蒸蒸日上。至清末民初，沈樂康購進宅旁費姓園地建築房屋，名為「昆樂坊晉業里」。楓涇鎮沈鐸家族除了部分業賈經商從事實業活動的之外，尚有不少科學入仕者，其著名的官宦人物有：鳳藻堂（沈起昌第五子沈壽創設）支的沈椿（字少譜，沈起昌的來孫，沈氏楓涇始遷祖沈鐸九世孫），貢生，任浙江嚴州府壽昌縣教諭，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保陞中書科中書，旋擢主事，簽分刑部雲南司行走年餘獎保四品銜、嘗戴花翎。沈椿長子沈明熾（字紹光，沈鐸十世孫），監生，宣統元年己酉（1909）過班知州，保陞直隸州知州，仍留江蘇補用，加給四品銜。清代後期，金山縣楓涇鎮沈鐸家族亦官亦商，實業蒸蒸日上，門庭簪纓聯翩，堪稱為當時上海地區一個興盛的望族。⁵⁹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上海資產階級逐漸成長起來，諸如葉澄衷、祝大椿、朱志堯、曾鑄等人的資產都在二百萬元以上。嚴信厚的資本總額在清朝宣統三年（1911）竟達到八百萬元，60至於一般的百萬富翁則人數就更多了。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增長，上海資產階級在「自治自立」的口號下發起地方自治運動。上海最初的地方自治機構，是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道臺黃祖絡為開發十六舖以南沿江荒灘而奏請清政府批准設立的南市馬路工程局。清宣統元年（1909），清政府玩弄預備立憲的騙局，頒佈《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令各地設立自治公所。地方自治運動遂在全國展開。上海在此運動中不但走在全國前列，而且很有建樹。在組織和領導上海地方自治運動中，又湧現出一批諸如李平書、葉佳棠、姚文楠、莫錫綸、郭懷珠等社會賢達、上海名流及著姓望族。例如，寶山縣人李平書（1853—1927。原名安曾，字平書，後更名鐘珏，號瑟齋，六十歲後別號「且頑老人」，十七歲補上海縣庠生。光緒丙戌〔1886〕優貢參加朝考，獲一等第十名，以知縣用。先後署廣東陸豐、新寧、遂溪知縣，政績卓越，是晚清官場難得的幹員。光緒己亥〔1899〕在署遂溪知縣任內因支持民衆反對法國

59 金山縣《楓涇沈氏支譜》。

60 劉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頁335。

侵佔廣州灣，受到革職處分。1905年起，李平書致力於上海地方自治事業，積極倡導上海地方自治，體現了一批上海紳商的意志，代表了他們的利益。李平書家族可以說是晚清民初上海地區一個以倡導上海地方自治名聞全國的新興望族。⁶¹

清代後期，上海知事沈寶昌曾說：「上海自外洋通商以來，地方風氣為之一變。」⁶²晚清在上海主持地方改良事業的吳馨也說：「開埠以來，時勢之變遷日亟。即此四十年中，水陸形勝、政教風俗以及工商百貨等等屢變不一。」⁶³總之，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歐風東漸，上海社會發展走上了與東西方社會發展都不相同的道路，社會風貌光怪陸離：腐朽與神奇共存，落後與先進並在。在望族形成的模式方面，則表現為傳統的科舉入仕與前述的二大類（即以經營沙船航運業起家 and 鎮壓太平軍起家與以辦洋務、外交、實業等起家）模式並存，這就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著姓望族形成的第三個特點，而此特點則完全是同當時上海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

科舉制度自隋朝創始、唐代確立以後，一直成為隋唐及其後的中國社會裏基本的考試制度和選官制度。直到清末，只是由於進步人士的反對、農民起義的打擊和以孫中山為領導的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纔迫使清政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頒佈了廢除科舉制度的上諭：「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⁶⁴但是，從此後直到清朝覆滅之前，為了抵制革命，光緒、慈禧及爾後的攝政王載灃等又變換手法，繼續頑固地實行了帶有濃厚科舉色彩的各項考試（諸如秀才補考優貢、拔貢的考試；舉人、貢生照會試例舉行的會考；國內各級學堂畢業生以及出洋留學畢業生的考試等等），給予合格者以秀才、貢生、舉人和進士等各種科名，⁶⁵用來籠絡士心，消弭革命，以達到其穩定統治的目的。總而言之，在整個清代後期（自道咸至光宣年間），清政府始終實行著科舉制度或繼續頑固地推行了許多帶有濃厚的科舉色彩的各項考試。因此，清代後期，上海地區以科甲起家的著姓望族頗多；且因他們大都由科舉高第入仕，故一般而言其社會地位也比經商致富或其他雜途起家者要來得高貴一些。例如，嘉定縣徐經家族。該家族創始人徐樟，字豫桐，諸生，舊志說他「道德高尚」。徐樟之子徐經，字恆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二十四年己卯，徐經鄉、會試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

61 民國《寶山縣續志》十四卷；朱鴻伯主編《川沙縣志》卷三十三《人物》，頁949；《李平書自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9-93。

62 《法華鄉志·序》。

63 《上海縣續志·吳馨序》。

64 《光緒東華錄》卷一百九十五或《清德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八，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甲辰，諭內閣。

65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第四章《停科舉後之各項考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頁170-184。

修，累官至濟東泰武臨道臺。咸豐六年(1856)徐經去世，終年六十九歲。徐經長子徐鄴，字李侯，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順天鄉試舉人，任兵部武選司郎中。徐經次子徐鄴，咸豐九年己未(1859)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元年壬戌(1862)進士，殿試進士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徐鄴多次掌握考試的大權，屢次得到陞遷，累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徐鄴之子徐致祥(徐經孫)，字季和，肄業於國子監。咸豐九年己未(1859)順天鄉試舉人，十年庚申(1860)恩科會試第一名(會元)，殿試二甲第七十五名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任大理寺卿，擢陞兵部右侍郎。徐鄴長子徐楨祥(徐經孫，徐樟曾孫)，累官至署直隸天津兵備道；次子徐厚祥，蔭員外郎簽分工部；第三子徐迪祥，蔭員外郎簽分度支部。徐致祥之子徐鼎襄、鼎康(皆徐經曾孫)及孫徐毓壽(徐經玄孫)，亦皆以父祖官位而蔭襲入仕。可見，嘉定縣徐經家族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典型的以科甲起家的名門望族。⁶⁶又如，嘉定縣廖惟勛家族。該家族創始人廖冀亨(廖惟勛的高祖)，祖籍福建，清初任江蘇吳縣知縣，為官清廉耿直，故在其罷官時僅餘青錢十九文，貧困至無盤川回歸故鄉，於是就定居吳中。其子廖王臣(惟勛曾祖)始入上海嘉定縣籍，錄為嘉定庠生。廖王臣孫廖文錦(惟勛之父)，字襄雲，有神童之稱，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進士，錄為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南陽知府，代理南汝光道臺。文錦之子廖惟勛(廖冀亨玄孫)，字炳之，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知府，加委道臺官銜，出任貴西道，咸豐二年(1852)死於揚州旅次。惟勛次子廖壽恆(廖冀亨來孫)，字仲山，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順天鄉試舉人，同治二年癸亥(1863)恩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次主持考試選拔人才，桃李滿天下，累次得到陞遷，歷任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軍機大臣。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八月病故。壽恆之兄廖壽豐(惟勛長子，廖冀亨來孫)，字谷似，咸豐八年戊午(1858)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十年辛未(1871)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經京官考核列為一等提名，因而取得道員資格。歷任浙江糧儲道、浙江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浙江巡撫，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病故，享年六十六歲。嘉定縣廖惟勛一家父子祖孫三代四登科，四入詞林，均歷高官顯宦，或為地方封疆大吏，或為中樞柄國權臣，簪纓鼎盛，一門煊赫，確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首屈一指的以科甲起家的名門望族。⁶⁷另外，諸如松江郡城東門外華陽橋鎮顧錫九家族、寶山縣高橋鎮陸萬鎰家族、青浦縣胡寶瓊家族等等，亦均是清代後期上海地區科舉入仕的著姓望族。

66 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民國《嘉定縣續志》卷十一；楊于白主編《嘉定縣志》卷三十五《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112。

67 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民國《嘉定縣續志》卷十一；楊于白主編《嘉定縣志》卷三十五《人物》，頁1108。

有關清代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的幾個問題

以上僅僅是粗綫條地勾劃出清代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發展的梗概。上海地區在清代分別屬於松江府(包括婁縣、華亭、青浦、奉賢、上海、金山、南匯等七縣和川沙一廳)和太倉直隸州所管轄的嘉定、寶山、崇明三縣，合計則有十一個廳縣。地域範圍既廣大，望族戶丁又頗盛。一些與望族有密切關係的問題，諸如科第的盛衰、門祚的長短以及望族興盛衰落的成因等等，大都頭緒繁多，情況複雜，然而這些問題又均為讀者諸君、尤為學人所深欲了解者。茲特將有關清代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的幾個問題，扼要簡述如下。

一、清代的上海地區，為甚麼有些普通平民百姓之家而能發展成為科第鼎盛、簪纓聯翩的著姓望族？反之，不少歷史上曾經鐘鳴鼎食的官宦世家、聲勢煊赫的衣冠之族，曾幾何時，卻又迅速衰落，甚至竟從歷史上消失？易言之，即清代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盛衰變遷的原因究竟是甚麼？這是很值得分析、研究、探索的社會歷史問題。筆者數年前在拙作《上海地區明清時期的望族》(《歷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一文中曾對明清上海地區望族科第的盛衰、門祚的長短等原因作過一些探索，認為能夠登上科舉入仕的榮顯之途以至創造望族的原因(並各舉例說明)，主要有如下幾點：(一)先輩中有賢明的母親或以孝行、義行或以人品端方著稱的祖先；(二)有選擇的婚姻；(三)向心的移植。此外，諸如先輩聰睿高壽、個人勤奮努力、師友提攜多助、際遇十分良好等等，亦均是科舉入仕並創造望族的重要因素。至於望族衰落的原因，則主要有如下幾點：(一)子孫後裔的不肖所造成；(二)戰爭破壞；(三)政治動亂和政治變動。此外，諸如天災、人禍和族內貧富分化及其內訌等等，也都是望族衰敗的重要因素。如今看來，上述這些觀點無疑同樣也適用於清代上海地區望族盛衰消長的成因。清代上海縣王世祿家族興盛衰落的變遷，可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當王世祿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病歿時，世祿繼母沈太宜人春秋已高，世祿二子王文源、文瑞則均幼小，王家全虧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世祿之妻張氏的鼎力苦撐，纔力挽王氏將衰之運。由於張氏這位茹苦守節的好母親的諄諄教導，王文源兄弟倆後來能夠成才，結果「中歲遂成素封之家」。王氏家族經商致富後又著意培養子孫讀書應科舉考試入仕，迨至張氏的曾、玄孫輩則「多讀書仕宦者」，終於成為清代後期滬上的著姓望族。而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太平軍進攻上海，以及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聯合鎮壓太平天國的迭次戰爭，也促使王世祿家族等上海一些著姓望族的衰落，如據王氏家譜記載：「本邑迭經喪亂，囊篋一空，家道中落。」⁶⁸

68 參閱《上海王氏家譜》和《續修[上海]王氏家譜》。

著姓望族大都在當地樹大根深，足以影響一方，故並非短時期內所能造就，而一般均需經過數代人的經營、積累方能形成。例如，清初崇明縣的宋德宜家族，它肇始於宋德宜之父明末御史宋學朱。崇禎季年，宋學朱以御史巡按山東時適遇清兵南下，戰歿。巡撫疏聞，忌者誣以不死，旨令覆勘，久不予卹。其子宋德宜時年僅十七歲，上書崇禎皇帝，得旨察議。議未決而明亡。南明時，福王贈宋學朱大理寺卿。入清，宋德宜在順治十二年(1655)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戶部右侍郎、刑部尚書。康熙甲子(1684)拜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恪」。德宜長子宋駿業以蔭入仕，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德宜次子宋大業，康熙乙丑(1685)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崇明宋氏，自明末至清初，前後經歷了宋學朱、宋德宜及德宜二子宋駿業、大業等祖孫三代的積累，纔逐漸形成為著姓望族。⁶⁹又如，清代中葉南匯縣吳省欽家族，它肇始於清朝康熙初年從江蘇丹徒縣移居上海南匯縣下沙鎮的吳自昌(吳省欽的高祖)。自昌之子吳燧(吳省欽曾祖)，康熙庚午(1690)副榜。吳燧嗣子吳啟秀(吳省欽祖父)，諸生。啟秀之子吳世賢(吳燧嗣孫，吳省欽從父)，乾隆戊辰(1748)進士，歷任湖北武昌、威寧縣知縣，攝江西興國知州。吳燧曾孫吳省欽(吳自昌玄孫)，字充之，乾隆二十八年(1763)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省欽之弟吳省蘭，字泉之，乾隆四十三年(1778)欽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工部左侍郎，晉陞侍讀學士。南匯吳氏，有科舉功名自吳燧始，歷經四世的積累，至吳省欽、省蘭昆仲時最後形成為清中葉南匯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⁷⁰再如，清代後期川沙廳高橋鎮朱其昂家族，也是累經幾代人的經營纔形成為望族的。朱其昂之父朱芾，國學生，出身於一個以沙船為世業的淞滬巨商家族，因奉委募帶水勇出洋捕盜和繼以辦海運出力，授同知加知府銜。當太平軍東進上海時，朱芾又奉命率軍會剿太平軍，屢立戰功，積勞病亡。清廷加贈朱芾道臺銜，並以朱芾之長孫蔭州判官職。這個淞滬巨商家族的後裔，經過朱芾棄商從政為官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迨至朱其昂、其詔及其懿時朱氏兄弟、子侄簪纓鼎盛，終成著姓望族。⁷¹同樣，清代後期上海客籍人盛宣懷家族，它肇始於宣懷之父盛旭(即盛旭人)。盛旭人富有貲財，於光緒二年購得蘇州閶門外那座明清江南名園之一的寒碧山莊，重加擴建，並改名為「留園」。故盛旭人以其實力為宣懷打下了雄厚基礎，而盛宣懷又以其出眾的才華終將其家族發展成為清季著姓望族。

69 乾隆《崇明縣志》卷十六；民國《崇明縣志》卷十一。

70 同治《上海縣志》卷二十、二十一；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另參閱吳省欽自編、吳敬樞續編《白華年譜》以及吳元琦修纂《吳氏宗譜》等。

71 民國《上海縣志》卷十七；朱鴻伯主編《川沙縣志》卷三十三《人物》，頁945—946。

至於望族衰替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戰爭破壞、政治動亂和天災、人禍等重要因素之外，則主要是由於子孫的不肖所造成的。例如，明代嘉定縣須氏望族，須之彥字君美，明萬曆戊戌(1598)進士，曾任光祿寺丞，晉陞尚寶司少卿，終年七十九歲，立牌位於浦江、桐鄉等地「名宦祠」，並列名於《浙江通志·名宦傳》。然據記載，迨至清朝初年，新署嘉定營守備須明徵，是「故尚寶卿須之彥猶子也，素無行，為鄉里所擯」，其被清政府任命為嘉定營守備後，「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錦綺懸佩刀，招搖市街間」。⁷²因此，清初嘉定須氏家族並不能像諸如青浦縣陸樹聲家族、上海縣潘恩家族、奉賢縣宋璫家族等等明代著姓望族那樣在清代繼續維持其望族的社會地位，原因就是由於須明徵等須氏子孫的佻達無行，「為鄉里所擯」而招致的。又如，明代華亭縣許氏望族，許樂善係隆慶辛未(1571)進士，官至通政使。樂善之孫許遠度，庠生，娶上海相國徐光啟之孫女為妻。許樂善曾孫許纘曾，清朝順治六年己丑(1649)進士，「歷官宮允，出為臬憲」。當許纘曾「康熙十二年癸丑請告回籍」之時，許氏家族「門第猶盛」，⁷³當時家資有四十萬之鉅。但這個許氏望族卻在許纘曾的不肖子許堯衢手中迅速地衰替下去了。許纘曾六十餘歲始生許堯衢，老來得子，嬌生慣養，許堯衢從小就「驕」、「嬌」二氣嚴重，沾花惹草，不求上進。副貢出身的許堯衢做過小京官，因不喜仕途而辭官歸里，但在華亭家鄉既不事生產，也不善理財，又極揮霍，結果許氏「四十萬家資，至堯衢暮年蕩然矣」。⁷⁴同樣，在清代中葉、後期的上海地區，類如清初嘉定須氏、華亭許氏那樣由於子孫後裔的不肖而衰替的著姓望族亦甚多，因篇幅有限，恕不臚列贅述。

明清中國是一個封建宗法社會。宗法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經歷了一個變化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清代普遍存在於全國城鄉的宗族組織，是宋明以來纔發展起來的。清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通過人口的迅速繁衍及宗族本身力量的不斷膨脹而形成的。望族形成的歷史表明：宗族發展到一定階段，宗族制度也逐漸完備，主要表現為纂修族譜、製定族規、經營族田、營建祠堂等等。如前述上海縣王氏家族，自王文瑞以經營沙船等工商業致富起家成為「素封之家」後，其子王壽康即「擴宗詞、輯族譜、置義莊田贍族」，⁷⁵逐步完善王氏家族的宗族制度。族譜、族規、祠堂、族田、族內行政組織等均是宗族制度的基本因素，每一個成熟的望族則莫不都由這些基本因素所構

72 朱子素《東塘日記》，《荊駝逸史》本。

73 《閩世編》卷五《門祚一》，頁119—120。

74 張壽甫《明清之際雲間許氏家傳》，載政協上海市松江縣委員會文史組編《松江文史》，第七期，1985年，頁63。

75 《上海王氏家譜·錄縣志輯庭公傳》。

成。特別是其中的族規，既體現了族權的各個方面，同時又充分體現了宗法制度在鞏固統治中的作用，故尤其為統治者所重視。族規的核心內容，則是宣揚敦人倫、崇孝悌以正綱常。《續修徐氏家譜》上册《家訓》載：「人倫之道，莫大於君親。書云：『移孝作忠。』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事親尤為人之本務也。』」故「孝」的更高要求，則是顯親揚名、貽親令名。對於這一點，清代上海嘉定縣錢氏望族的代表人物錢大昕說得十分明白：「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父母之樂，莫樂於有令子。」⁷⁶可見，除了對父母生養死葬盡心盡孝之外，還要入仕為官，光宗耀祖，方能稱為大孝。另一方面，做官既可以提高個人乃至宗族的聲望，又可以在短時期內發家致富。因此，在清代上海地區幾乎所有宗族都不甘寂寞，許多族規家訓都明文鞭策族人通過科舉考試躋身官場，或者興辦家塾族學培養宗族子弟讀書應科舉入仕，謁求飛黃騰達，不斷地擴大族產並維繫宗族的社會地位。例如，清代上海望族士大夫葛尚忠訓誡兩子就說：「吾辛勤所積，豈徒使汝輩溫飽乎？將籍以為子孫成名之資也！」⁷⁷總而言之，族人出仕為官並且「代有高官顯宦」，乃是著姓望族能夠形成和經久不衰的關鍵所在。而與此相反，即凡是族人出仕者官職卑微，或者族人中讀書做官者愈來愈少甚至竟無出仕從政為官者，那末該著姓望族便會衰替乃至敗廢。

二、《孟子·離婁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但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優生學家潘光旦在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一書中就曾指出：「古人所下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斷語是不確的。」⁷⁸潘光旦曾對明清時期浙江省嘉興地區九十一家望族的門祚作過統計，其中，門祚短者是四世，有八家；門祚最長的是二十一世，僅一家。他的結論是：「嘉興的望族，平均每家大約能夠維持到二百一、二十年。」⁷⁹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據筆者的研究，也表明了「君子之澤」是不一定「五世而斬」的：明清上海地區著姓望族有的門祚較短，僅歷三、四世或者五、六世就從歷史上消退了；但也有的望族卻門祚很長，延續了七、八世，有的維持了十二、三世，有的門祚竟長達十七、十八世的。例如，奉賢縣陳良用家族，從元末明初的陳良用（元朝至元丙子輸粟賑饑，元廷下旨授予冠帶。明初洪武庚戌年卒，享年八十七歲）算起到清朝道光八年戊子（1828）副貢陳光適（歷署寶應、宿遷等縣訓導），前後計有十八世之多，貫聯明清兩代，歷時五百餘年。陳良用是宋朝太傅陳堯咨的十一世孫，所以，如果從陳堯咨這位宋朝太傅算起，那末陳良用家族迨至

76 錢大昕《原孝上》，載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三《禮政》。

77 《上海葛氏家譜》，民國十七年（1928）版。

78 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六年（1947），頁94。

79 同上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清朝道光、咸豐年間的陳光適則前後計有二十九世之多，歷經宋元明清四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上海地區門祚最長的一個著姓望族了。⁸⁰ 基於此原因，本文所論述的關於上海地區清初、清代中葉和清代後期這三個時期的著姓望族，顯而易見他們是不可能截然劃分、各不相屬的。筆者之所以將他們分成三個時期來論述，主要是爲了撰寫時便於操作而已。而在事實上，清代上海地區前後三個時期的著姓望族之間彼此是有聯繫的，並且有的後一時期的望族往往是前一時期著姓望族的延續、維持或發展。例如，清初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除了一些趨附滿清新主子的領兵武將助官「新貴」和在新朝以科舉入仕起家的新興望族（諸如金山縣王廣心家族、上海縣曹綠岩家族等）之外，還有許多明代的著姓望族（諸如奉賢宋璫家族、青浦陸樹聲家族、金山曹豹家族、上海縣潘恩家族等等）都在清初被延續和維持了望族的社會地位。同樣，迨至清代中葉，在上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背景下產生了一批新興望族（諸如寶山縣印光任家族、崇明縣徐大始家族等等），但這批新興望族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清初以來上海一些世家望族因遭其取替而消亡於歷史舞臺。實際上，有些清初以來上海地區的顯赫望族由於能掌握歷史發展的脈絡而順時應變，故仍保持其望族地位於不墜。例如，在清代中葉，大名鼎鼎的婁縣張祥河（張梁曾孫、張淇玄孫。字元卿，號詩齡，嘉慶進士，道光年間晉陞陝西巡撫，累官至工部尚書，卒諡「溫和」）家族乃是清初婁縣張淇（字爾瞻，清初自上海縣三林塘移居婁縣倉家橋。四子皆有科舉功名：張彙歷官刑部郎中；張集係康熙丙辰進士，累官兵部左侍郎；張維煦係康熙壬午舉人；張梁係康熙癸巳進士）、張照（張彙子、張淇孫。字得天，又號天瓶居士，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乾隆十年暴卒於峒崕旅次，諡「文敏」）這個顯赫望族的延續和發展。清代後期也有類似情況。由於家學淵源的影響、錦上添花的馬太效應的作用等諸多因素，著姓望族一旦形成後往往有其歷史連續性，清代上海地區有些望族則歷時較長。例如，嘉定縣廖冀亨家族，自清初以來，歷經清代中葉、後期至民國年間，甚而垂至今日仍名賢輩出，代有傳人。關於廖冀亨至其六世孫廖壽豐、廖壽恆輩的廖氏家族簡史，本文前此已揭。廖氏七世孫中名人亦甚衆，如廖世經（星石）歷任嘉定縣學務總董、奉天承德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克己奉公，以循吏稱，其子廖家祜（廖氏八世孫）則爲嘉定1928年「五抗」鬥爭的領導人；廖世功（1877—1955）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後留學法國法政大學，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回國考授法政科舉人，歷任駐比利時公使、中國駐國際聯盟首席代表等職，1952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館研究員。廖世承（1892—1970），號茂如，是著名教育家，歷任光華大學

80 拙書稿《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之第五章《貫聯明清兩代的上海望族》。

校長、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上海師院院長，開創了我國獨立辦師範大學的先河。廖氏九世孫廖有謀、廖有楷等在學術上也多有建樹。廖氏傳至今凡十一世。⁸¹

三、唐宋以後，從北方等全國各地徙居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地區的移民日益增多。明清時期，上海地區重心的上海縣的人口數字，一般均徘徊在五十二萬至五十五萬人之間。⁸²但迨至清代後期，由於上海開埠，中外互市，「僑寓日多，孳生日衆，居民號稱百萬，實有八十萬」，致使上海「戶口之衆，除京師外，首推巨擘」。⁸³但是，清代上海「人數之多，實由五方雜處，客籍多於土著」。⁸⁴衆所周知，移民是人中最活躍的分子，他們能夠主動地選擇生活環境，一般都富有生命的活力，並往往歷經磨難，見多識廣，故善於在生存競爭中獲勝。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移民及其後裔，他們之中一些人或通過科舉取得青紫，成爲衣冠之族；或通過商品貨幣關係的競爭先成爲「素封之家」，然後再著意培養子孫讀書應科舉入仕以至創造望族。清代上海地區由移民及其後裔創造的望族甚多，諸如上海縣王氏家族（據《上海王氏家譜》陸蔭奎序：「上海王氏係出太原。」）、嘉定縣廖氏家族（廖氏祖籍福建永定縣清溪鄉，嘉定始遷祖廖莫亨，曾任吳縣知縣，罷官後寓居吳中，雍正末年遷居嘉定邑城）、青浦縣胡寶瓌家族（胡氏世籍皖南徽州府歙縣，代有名儒，人物科第之盛甲於江左。寶瓌之父胡廷對，自溧陽訓導補寧國遷婁縣，終常州府學教授。胡寶瓌遂家青浦焉）、滬上李也亭家族（李氏世籍浙江寧波小港的港口村，道光年間李也亭隻身來滬開拓，發家致富，遂成望族）、申江席氏家族（席氏世籍蘇州洞庭東山，清咸豐年間席元樂因太平軍東進而舉家遷移上海⁸⁵）等等均爲由外地遷入上海地區的移民或其後裔所創造的著姓望族。

四、清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之中湧現出了諸如戴有祺、王敬銘、宋德宜、王鴻緒、錢大昕、王昶、王鳴盛、廖文錦、胡寶瓌、吳省欽、張照、徐郙、印光任、張祥河、李也亭、徐致祥、盛宣懷、朱其昂、席正甫及高燮等一批達官名宦、巍科人物、經學家、史學家、詩人、工商業者和學者、名士。這些望族名流對於清代上海地區的社會經濟以至於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科學文化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綿延至近現代的上海，這些望族名流的後裔之中又產生了諸如黃炎培、宋慶齡（其外祖父倪蘊山在清代道光乙未年生於川沙廳城東北側倪家宅，其外祖母徐氏則係明代上海相國徐光

81 楊于白主編《嘉定縣志》卷三十五《人物》，頁1092，1117，1128；張振德主編《嘉定古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頁66—67。

82 參閱拙文《明清時期上海邑城的社會經濟結構探索》，載《上海研究論叢》，第五輯，頁75—76。

83 李維清編纂《上海鄉土志》第三十七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5。

84 同上注。

85 吳培初《舊上海外商銀行買辦》，頁96—100。

啟的後裔)等等對於中國現代革命發生了極大積極作用的優秀人物。如今，這些望族的子孫後裔除了大部分定居上海、北京、南京等國內各地之外，尚有不少的人散居海外各處。因此，今天研究清代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及其盛衰消長變遷，實乃研究清代上海社會經濟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Eminent Families in the District of Shangha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Summary)

Wu Re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district of Shanghai became the centre of China's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its eminent families — the leading force in society. These eminent famili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ncluded mainly military officers and civilian officials who had rendered services to the Manchu aristocrats in conquering the nation, intellectuals who had made their name and fortune as a result of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us being appointed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decendant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se eminent families in Shanghai were replaced by those who had been profitted by the "sprouting and developing of capitalism" in this district.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minent families in Shanghai bor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period: first, a great number of eminent families gained a huge fortune by running large junk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or by "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ocean shipping companies"; second, a number of new eminent families were known for their roles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Uprising,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as com-pradors or in the initiation of self-government in Shanghai.

The study of the eminent families in Shanghai as well as their rise and declin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of Shanghai and even of the whole country during that perio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